

文化术语释译为我性探析

信 娜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文化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文化概念的约定性符号，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释译即解释性翻译，往往适用于所指概念专属某一民族的文化术语。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以译者的各种目的为指导，文化术语释译的目的正在于为译语文化受众提供源语文化信息，向世界传播源语文化，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化术语释译的目的性充分论证了译者的“为我性”，即译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在释译中华文化术语时，译者采用了详细释译、归化释译、显化释译等策略，以尽可能地如实传递中华文化术语的概念信息，实现翻译的目的。译者的“为我性”规定了“能动性”的方向，对我国文化术语的外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文化术语；为我性；释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翻译是语言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丰富。“当文化发现自身存在一些不足时，便诉诸翻译，以填补这些不足”。(G.Toury 2001: 14) 文化术语是民族思想基因，孕育于特定民族文化土壤，是人类文化交流、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精髓与灵魂所在。文化术语的翻译是向世界传播民族文化、实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关键。不同于一般的文本类翻译，文化术语翻译过程中，语言形式转换受符号空间所限，概念意义再生受文化隔膜阻碍，译者只能通过自身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对比、分析和感悟，才能准确翻译文化术语，将文化术语内隐的意义外显。文化术语的释译过程恰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过程。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是译者主体性的主要特征。为我性是主体性的核心，指的是主体在对象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使对象“为我服务或从主体出发的特性”。文化术语翻译的为我性实质上是以译者代表译入语文化需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翻译主客体关系，即译者按自己所意识到的译入语文化需求，决定其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从而实现翻译目标，为我所用。我们以《华俄大词典》(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Ошанин И. М.主编) (1983) (以下简称《华俄》) 中某些文化术语为例，详细分析文化术语释译过程中译者为我性的具体体现，以期对我国文化术语外译提供思路及借鉴。

2 详细释译为我所解

详细释译，是指译者在充分理解文化术语意义内涵的基础上，通过详细阐释的手段将原语术语的意义用译语再现。文化术语，特别是思想文化术语，“常常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象或独特的精神内涵，有些术语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陈海燕 2015) 文化术语意义的丰富性与多层次导致译者很难在译语找到绝对匹配的对应词或对应短语。为实现文化术语的准确传达，译者需要对文化术语进行详细释译，即通过归化、显化、引申等策略，将文化术语内隐的意义外显，从而实现翻译目的。

语的译语传播，译者需将原文术语丰富的意义尽可能地说清楚，增加译文术语的透明度，让译语读者了解其文化内涵。在词典释译中，译者常用增补义项的方法，将文化术语的意义逐项列出，分别找出对应术语实现跨语传译。这一方法适用于意义浓缩、概念抽象的思想文化术语。此外，译者还可通过译例，帮助读者了解文化术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所指，全面了解该术语的文化内涵。

1) 增补义项

义项是字典、词典中同一个条目内按意义分列的项目，义项的确定是词典编纂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受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义项确定的标准、原则等因素的影响。语言的意义内容千差万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义项和不同的语言符号结合构成的义项来表述，从而出现了不同辞书对同一语言单位义项划分的差别。如文化术语“仁”，因其内容的丰富性，不同译者/编纂者会据其认知并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来划分义项，进行释译，不同国家的译者，因其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差异，同一文化术语的义项划分更是不同，详略各异。《汉俄大词典》中，“仁”的俄译为：гуманность(гуманный); человечность(человечный);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е(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вый)（顾柏林 2009: 1712），译者列出了最常见的三种俄语译法。与之不同的是，《华俄》中“仁”的义项共4类，分别为名词类、形容词/副词类、动词类及专有名词类义项，每一类义项包含几个义项。其中，将“仁”做文化术语解释的义项共4项，具体摘录如下：

[1] 仁： сущ. 1) филос.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е, гуманность; доброта, человечность; равно благожелате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людям: 仁爱 гуманность и любовь; 2) сострадание, милосердие;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ь, филантропия: 施仁 проявлять милосердие,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ствовать; 3) гуманист, человеколюбец; добрый человек, филантроп; человек с большой буквы: 泛爱众而亲仁 любить всех людей и сближаться с лучшими, достойнейшими; 4) (вм. 人) человек (особенно о единомышленниках, товарищах) (И. М. Ошанин 1983, Т.2: 25)

《华俄》将文化术语“仁”从4个角度展开释译，首先将其核心意义，即哲学上的“仁”放在第一、二位，列出俄国历史上出现的俄译版《论语》中“仁”的不同译法，如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е, гуманность, человечность, милосердие等，这些同义词表达了人性、人道、仁爱、仁慈的意思，此外，义项1)、2)中，还将доброта(善良)、равно благожелате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людям(平等友善待人)、сострадание(怜悯、同情)、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ь(行善)、филантропия(博爱)等意义纳入其中，目的在于让俄语读者将陌生的“仁”与其所熟知的доброта(善良)等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仁”的内涵，虽然这一释译歪曲了“仁”的文化意义。义项3)将“仁”释译为“具有仁的人”，即1)、2)义项的表人名词表达，还指出，“仁”即大写的“人”。义项4)将“仁”与“人”等同，特指志同道合者、同志。

对比中俄译者对“仁”的义项划分及释译，我们发现，与汉译者相比，俄译者会增补义项，更加细致地描述“仁”的意义内涵，目的是让俄读者全面了解“仁”的内涵。

2) 译例结合

作为词典的主要组成部分，例证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为词目的使用提供典型语境，对词目及其用法具有显著的阐释作用和准确释译的决定性作用。文化术语因其所对应的概念客体差异而具有特殊性，独特的文化基因需要语境辅助才能正确理解，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外译更是如此。因此，为实现文化术语的跨语传递，例证的语境提示性不可忽略。借助于例证，译者可为读者传递更多地文化信息，实现翻译目的。如“道”的释译：

[2]道： Сущ. 8) филос. Дао, истинный путь, высший принцип,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道通天地，有形外 Дао пронизывает небо и землю и является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альным 道生一，一生二 Дао родит Единое (хаос), Единое родит двух (небо и землю) 9) Даосизм, учение даосов;

даосский монах, даос (И.М. Ошанин 1983, Т.4: 96)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道”的理解和翻译多种多样。为使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道”的内涵，译者在释译文化术语“道”时，结合例证，说明“道”的内涵。如“道生一，一生二”翻译为：Дао родит Единое (хаос), Единое родит двух (небо и землю)。在具体的语境中，俄语读者可了解，文化术语“道”的哲学阐释：“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是独一无二的。

3 归化释译为我所有

归化翻译追求的是同一性，是一种自我认同，并在译入语文本中寻求与译入语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即在异国文化中寻找同一个自我。翻译是一种“文化互渗”行为，文化术语的翻译更是将一种文化输入到另一种文化中。在输入的过程中，考虑到读者的反应与接受，译者有时会迎合读者的认知认同，采用归化释译方法。

1) 以我释异

涉及文化翻译，“归化”“异化”无法逃避。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还是把译入语读者带入原语文化，翻译界一直争论不休。我们认为，“归化”是一种最省力的策略，一方面，译者无需去深究所译内容的文化内涵，用自己所熟知的、已有的符号去等值转译，即可完成翻译任务；另一方面，译语读者暂时无需追究该译文与原文的文化差距，可基于已有的认知去解读译语文化，暂时达成文化的和解。归化策略的使用正是译者顺应译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和文化意象，实现翻译目的的具体体现。

[3]龙： дракон；影壁上画了一条～ на каменном экране нарисован дракон (И.М. Ошанин 1983, Т.4: 363)

“龙”的外译一直是翻译界、文化界讨论的热点。在中华文化中，“龙”展示着团结向上的民族精神，是国家的象征，译入语译者因携带相异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烙印，会使用本族语中的 dragon、дракон 归化释译文化术语“龙”。在西方文化中，包括俄罗斯，dragon/дракон 一直是邪恶、凶狠的形象，与中华文化中的“龙”相距甚远。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一归化译法造成了“龙”的文化义项的错位，形成了长期的“误译”，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但对于英语或俄语读者，dragon/дракон 却是其熟知的文化意象，容易理解。姚翠平等（2018）通过对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当中西方龙与 dragon 互换时，25 名被测试者能准确认知中国龙与西方龙情感意义的差异性并赋予两者相应的含义，不存在误解或错译现象，即 25 名被试者认为 dragon 为龙的合理翻译”。这一调查应被试者范围较小，结论或许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归化翻译是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为“我”所译的积极策略之一。

2) 仿造释译

每一种语言或文化都很少是自足的，需向其他语言或文化借用某些元素，这样就产生了外来词。外来词的产生途径有多种，或通过描写概念产生，或“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素，把原词的意义和内部构成形式都移植过来”（叶蜚声 1997: 198—199），这一方式就是仿译。通过仿译表达新概念和新事物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因“仿译”具有“可还原性，体现了词的理据，便于学术和文化交流”（金其斌 2007），完全适用于文化术语的外译。如“五星红旗”的俄译：

[4]五星红旗： Пятизвездный фла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флаг КНР) (И.М. Ошанин 1983, Т.2: 240)

“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国的象征，更是中华文化术语，跨语翻译时，译者可仿造“五星红旗”的表述法，将每一词素转换成译语，如俄语Пятизвездный флаг，

其中пяти-为“五”，звёздный表达“星”，且пятизвёздный为形容词形式，修饰后面的флаг（旗），从字面看，пятизвёздный флаг并未将“红”的意义表达出来，但并不妨碍俄语读者的理解，因为Пятизвёздный（五星）这一义素足以区分“五星红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

3) 等值替换

奈达（1969：12）主张“翻译是指首先从语义上，其次也在文体上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再现源语信息”，具体体现为文体等值、社会文化等值、语言等值和形式等值等。文化术语指称民族文化概念，跨语翻译是一大难题。有时，译者可以在译语中寻求与原文文化术语在社会文化方面等值的术语替换，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让译语读者接受。

[5] 春节：1) Новогодний праздник; Новый год (по старому календарю); 2) весенний сезон, весна(И.М. Ошанин 1983, Т.2: 577)

文化术语“春节”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根据这一意义，《华俄》译者将俄语中的Новогодний праздник, Новый год（新年）与其对应，这一等值替换可利于俄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俄罗斯人的“新年”和中国的“春节”所指概念完全不同。虽然读者接受，但文化术语原有的意义不复存在。因此，译者在Новый год后加注по старому календарю（根据旧历），从而更好地传达了“春节”的内涵意义，更利于俄语读者认识中国的“春节”。

4 显化释译为我所用

所谓显化（或明晰化），是指译语文本以更明显的形式表述原语文本的信息，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隐含的信息转化为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人类语言具有隐含性，特别是文化术语，其意义更具隐含性与不言而喻性。在词典释译中，文化术语的显化处理主要包括其隐含意义以及语境意义的译语表达。

1) 隐义明示

文化术语是历史的沉淀、文化的精髓，其所表征的概念与范畴包罗万象。文化术语语言简意丰，浓缩性很强，简单的语表形式背后是丰富的意义内涵。若想更好地实现文化术语翻译的目的，译者需将部分隐含的意义用译语再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译语读者的认知难度，使其更好地理解所译术语的文化内涵。将隐含的意义明示，译者常在译语表达过程中增添某些关键性、对理解具有提示作用的语义因子，而在文学作品中，译者常通过脚注或尾注的方式进行注释，将文化术语的言外之意传递给读者。

[6] 人治： Конф. управление [страной] личным примером правителя; личность правителя как решающий фактор порядка в стране (И.М. Ошанин 1983, Т.3: 585)

“人治”指的是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君主依靠贤能来治理国家。“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治国理论，“儒家学说”对于“人治”的理解具有重要性。所以，在其俄译时，将隐含的语义因子“儒家学说”用俄语再现。此外，译文将“人”具体化为личный пример правителя，即“个人统治者”，将隐含语义“国家”现于语表，并在另一译文中将“人”强化为как решающий фактор порядка в стране，即“是国家秩序管理的关键因素”，这些隐含意义的透明化可让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人治”的内涵。

2) 语境括注

“文化术语具有阐释的语境性”（魏向清 2018），汉语文化术语多源自传统典籍，其概念内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厚重，最终呈现出意义的叠加与复杂。因此，在文化术语释译时，需具有语境预设性，即将文化术语所指概念的语境进行译语表达。通过语境注释，译语读者可了解文化术语的产生语境，掌握其概念发展历程。如“旗袍”“科举”的释译：

[7]旗袍：ципао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женское платье обычного во времена дин. Цин покроя; позднее, в несколько изменённом виде - обычное в Китае женское платье, длинное, в талию, со стоячим воротником и широкой правой полой) (И.М. Ошанин 1983, Т.4: 648)

“旗袍”属物质文化术语，其意义的复杂性远不及制度文化术语以及思想文化术语，但因属于中华民族特有，对应的概念客体为俄罗斯民族所缺失，为使俄语读者明晰“旗袍”的概念内涵，释译时需将其产生的语境一并阐释，注释其隐含的语境因素，即“满洲妇女日常穿服装，清朝服装样式，后发生改变”。同时将其概念特征揭示：中国女士服装，长式、收腰、立领、宽前襟，将“旗袍”形象细致描述，尽管俄国人未曾穿过“旗袍”，但通过译文也可在脑海中想象其样子。可见，隐义的注释可使读者更容易掌握文化术语的概念所指及内涵。

[8] 科举：кэцзюй, отбор путём экзаменов (старая, до 1905 г., систе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экзаменов в Китае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учёной степени и права поступления на должность) (И.М. Ошанин 1983, Т.2: 940)

“科举”属制度文化术语，是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促进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同时兼具教育、选官、考试、社会分层、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很难准确获取该术语的意义。因此，译者在“音译兼义”的基础上对该术语进行了括注，即“1905年以前，中国国家考试制度，用以考取学位以及获得做官的权利”，对“科举”存在的时期、所指概念主要特征以及功能进行了补充，实现了文化术语意义的跨语传递。

5 结论

主体的本质表现在其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特征中，而这些特征构成了翻译主体译者的主体性。

目的论充分论证了译者主体性中的为我性这一方面。这一理论的准则就是目的解释手段。这种理论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以译者的各种目的为指导。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译者会调动他各种能力，采用不同策略来解决翻译中的各种困难。文化术语文化异质性鲜明，翻译难度与实践意义成正比，具有更鲜明的目的性，即译者的“为我性”。文化术语的意义具有浓缩性，译者常通过增补义项、译例结合等途径将文化术语输入到另一文化中。译者有时会迎合读者的认知认同，采用归化释译方法，包括以我释异、仿造释译、等值替换等方法。此外，译者还会使用隐义明示的方法，即将原语术语隐含的意义用译语再现或使用括注的方法将术语理解的语境表达出来。所有的翻译策略都很好地体现了文化术语释译的为我性。译者的“为我性”是发挥其“能动性”的方向和指南，可用其探讨我国文化术语的外译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Nida E. 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69.
- [3]Ошанин И. М. 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ом 1-4)[Z].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 [4]陈海燕. 浅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中的难点[J]. 中国翻译, 2015(5).
- [5]顾柏林主编. 汉俄大词典[Z].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6]金其斌. 汉语外来词翻译中的仿译研究[J]. 中国科技术语, 2007(2).
- [7]魏向清. 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英译看文化术语翻译的实践理性及其有效性原则[J]. 外语研究, 2018(3).

- [8] 姚翠平、汤红娟. 外宣翻译中文化意象错位调查及其对策研究——以两会期间“龙”的校译提案为例[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5).
- [9] 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On Egoism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erm's Paraphrase

Xin Na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terms are the reductive symbols that express cultural concept through spoken or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y are the direct or indirect refl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 language. Paraphrase is the 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 often applied to cultural terms specific to one country or race. Every kind of translation is directed to a certain audience and guided by the purposes of the translator. The purpose of cultural terms paraphrase is to provide the source language cultural information to the target cultural audience and to achieve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araphrase of Chinese cultural terms, the translators adopt such strategies as detailed paraphrase, domesticating paraphrase and explicit paraphrase, so as to convey the conceptual information of cultural terms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egoism defines their initiative, which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terms in China.

Key word: cultural terms; egoism; paraphrase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UNPYSCT-2016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信娜，女，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收稿日期：2020-01-05

【责任编辑：靳铭吉】